

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 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隨著台灣政治由威權統治轉型為民主政治，台灣的族群關係也進入不同的階段。在威權時期，族群緊張來自外省族群在政治上的宰制，以及對本土文化的壓制。源自政治的族群緊張同時也滲透入社會領域，造成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社會隔離。民主化之後，政治宰制雖然不再，卻由於認同的興起和對立，族群關係進入另一個階段。本文以全國性的訪問調查資料為基礎指出：第一，雖然在母語的使用上台灣漢人有三個族群，可是在族群政治上只有兩個族群：本省人（閩南和客家）和外省人。第二，威權時期中因政治而來的族群社會隔離，經過數十年的相處以及民主化之後，已大為消弭，甚至不復存在。第三，然而，由於台灣認同的興起，本省人對外省人存有普遍的不信任感。樣本中將近半數的本省人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這種政治上的不信任，是目前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問題。第四，此種政治上的不信任並沒有因社會關係的融合而消弭。「社會交融、政治隔離」是目前台灣族群政治的本質。

關鍵詞：民族認同、民族主義、族群、族群政治、族群關係

The ethnic relations in Taiwan entered a new stage, as the country moved toward liberal democracy in the late 1980's.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of the Kuomintang was marked by political domination by a minority group of Chinese mainlanders, whose repression of native Taiwanese local culture created political tensions and social animosity between two groups. As the transition to democracy broke down the minority's political domination, a new Taiwanese identity was also created along the process. The conflict between native Taiwanese and Chinese mainlanders upholding different identities continues to serve as the center of ethnic politics in the country. Based on the data collected from several sets of nationwide house interview surveys, this article shows, a) As far as the ethnic politics is concerned, there are only two ethnic groups in Taiwan-- native Taiwanese (including *Minnan* and *Hokka*) and Chinese mainlanders, as opposed to commonly held assertion of three ethnic groups with their own languages/dialects; b) due to the political chang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five decades, the social animosity and segregation between two groups have been greatly decreased; c) the rise of new Taiwanese identity and its conflict with the Chinese one has resulted in a widespread sense of distrust among native Taiwanese; and d) social contact (measured in terms of inter-marriage)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has not decreased the political distrust. It appears that a combination of social assimilation and political tension best describes the nature of ethnic relations in current Taiwan.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ism, ethnicity, ethnic politics, ethnic relation

一、前言

族群關係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的議題之一。儘管當代台灣的政治發展曾經歷經巨變——從威權獨裁統治到民主化，族群關係卻一直是台灣政治中主要的緊張和衝突點。只是在不同的政治發展階段和不同性質的政權中，台灣的族群關係有不同的衝突核心。在戰後的第一階段中，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是，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對本省人的政治宰制、對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而引起的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和緊張。可是隨著政治民主化，人口多數的本省人在政治上取得絕對的優勢，外省人則失去了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另一方面，台灣社會和經濟也歷經巨大的變遷：教育普及、都市化、人口流動和互動頻繁、急速經濟成長所帶來的開放性就業機會、以及開放性的階級結構等。這些社會變遷積極地增加了族群之間的社會接觸，消極地防止了因單一族群壟斷社會經濟資源而可能產生的社會分歧。在民主化和社會變遷共同作用之下，族群關係中的政治怨恨和社會敵意逐漸消逝。

族群之間的政治怨恨和社會敵意雖然逐漸消逝，一個新的、不同性質的族群緊張關係卻開始出現。這項新的族群緊張是本文的焦點。在民主台灣的政治階段中，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是認同的衝突。這和民主化之前的族群關係，有很大的不同。台灣的族群關係在民主化之前，是以政治宰制所造成的政治抗爭和社會敵意為主要的表現方式。而在目前的第二階段中，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不再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的衝突，而是象徵層次上「認同」的衝突；這項衝突導致了居多數的本省人對少數外省人在政治上的不信任。面對中國強敵的威脅，此種政治不信任是當前台灣族群關係的癥結。這是本文的論點。更仔細地說，本文以本省人對外省人的主觀態度為分析焦點，試圖指出：第一，目前台灣族群衝突是純政治性的，只存在於政治領域中；在社會生活領域中，本省人和外省人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

隔離已逐漸消弭。第二，這項緊張關係來自兩個族群在認同上的衝突。第三，由於這項緊張是源自認同的衝突，而非族群的文化差異、社會隔離、或族群偏見等，族群之間頻繁的社會接觸和社會融合，因此並未能減低其政治緊張關係。第四，另一方面，這項政治衝突也未影響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交往。「社會歸社會，政治歸政治」，似乎是當前台灣族群關係的特質之一。¹

台灣的政治發展歷經兩個清楚的階段；族群關係，或族群緊張和衝突，在不同的政治發展階段也有不同的性質。在威權政治時期，民主化固然是台灣政治發展的主軸和動力，可是族群關係卻一直是形影相隨的重要主題，尤其是 1970 年代以後。我們甚至可以說，台灣的民主化運動同時也是族群運動；民主化的目標之一即是在打破外省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在公開的政治論述中，特別是在私下政治討論中的「隱藏台詞」(Scott 1990)，「外來政權」、「外省人的壓迫」等說法頗為常見。而民主運動中的參與者和領導者，也幾乎全為本省人。一直到現在，由民主運動演進而來的民進黨，其參與者、支持者、甚至選民，幾乎全由本省籍的民衆所組成。這些都顯示了台灣民主運動的族群性質。此種民主運動和族群運動相結合的現象，主要是來自威權統治集團的族群組成。民主運動所要建立的民主體制，一方面可以摧毀威權政體，同時也可以打破外省人對政治權力的壟斷。反對運動所反對的，不單只是不民主的威權統治，同時也是族群的政治壓迫。這種政治理念和身分認同的結合，對台灣的民主運動或有某種程度的強化作用。

此種民主運動和族群運動的結合，雖然是統治集團的族群組成所造成的結果，可是卻非其必然的結局。台灣的政治發展歷程中，有一次機會可以減低政治抗爭的族群色彩；那就是以外省自由派知識份子

1 也就是說，本文對台灣族群關係的分析，只限於從「本省人」的眼中觀看「外省人」。至於外省人在失去政治優勢地位、同時又處於台灣意識勃興的現階段，他們如何看本省人、如何理解自身的處境，則是本文無法處理的問題。國內目前已有的大型問卷調查研究，也都缺乏足以深入處理這個問題的資訊。這應該是往後的族群研究必須仔細探究的題目。對此题目的初步探討，參閱張茂桂、吳忻怡(2000)。

為首、試圖和台灣本土政治反對人物結合的「自由中國」民主運動。可惜這個運動終不免於被壓制。之後繼起的第二代外省籍自由派知識份子，在第二波的民主運動中，不再以參政、而是以論政為主要工作。第二波的民主運動早期，雖然有少數外省籍人士的參與（如費希平、林正杰、傅正等），可是在「民族認同」的議題浮現之後，他們不是被邊緣化就是選擇離開。缺乏外省人的參與，民主運動難以避免地帶有更濃厚、更強烈的族群色彩。如果「自由中國」的民主運動沒有被壓制，如果第二波民主運動中有較多的外省領導人物，美麗島事件中有顯著數目的外省人被捕、監禁，台灣目前的族群關係（或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族群意象）或會有顯著的不同。²

無論如何，這個階段中的族群敵意主要來自政治壓制和文化壓迫。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固然重要，其後對台灣文化、台灣歷史、和台灣語言的壓制，同樣是造成族群政治敵意的重要原因。透過壟斷教育、文化、和媒體機構所進行的大規模「中國化」，固然在部分本省籍民衆身上成功地培養了中國認同，可是卻同時為族群敵意造就了堅實的基礎，提供了族群政治的強大火力。張茂桂和吳忻怡(2000)所指出的，族群關係中重要癥結的「尊重與承認」，正是這個階段中台灣族群政治的主題。Donald Horowitz 早在其 1985 年的名著中，就特別強調身分、尊嚴（尊重）、承認等文化象徵和社會心理在族群衝突上的重要角色。語言的使用或壓制，不只影響到職業生涯，更重要的或許是對族群身分、族群「價值」(worthiness)的肯定或否定。唯有理解弱勢族群對「身分要求」(status claims)的重視，我們才較能理解族群政治中的一些重要現象，例如「正是那些個人的價值感(personal worth)

2 一個對比的例子是，近千位就讀於美國長春藤盟校的白人學生於 1964 年到密西西比參與民權運動的「自由夏天」。該次運動一直被視為社會運動中輿論宣傳的典範；因為這些來自美國上層社會和菁英大學的白人學生，他們對運動的參與和所冒的危險引起了全國的注意。然而，運動中一位黑人領袖在提到白人志工的價值的時候，卻說道：「密西西比黑人的怨懟開始消失，當他們看到這些白人學生準備犧牲一切來幫助他們……這些來自其他地區的白人和他們在當地看到的是同一個膚色、外貌也相似，可是卻和我們並肩工作、住在我們的家裡，甚至挨了炸彈和子彈都不退卻。這讓密西西比的黑人對白人有了全新的印象」（引自 Wilkie 2001: 137）。關於「自由夏天」運動，社會學者的討論，參見 McAdam (1988)；參與者的紀錄則參閱 Belfrage (1990 [1965])。

沒有受確認的族群，最熱烈尋求以政治的權威力量確認其族群的價值」(219)。

這個階段中族群緊張之根源雖然是政治的，可是卻也滲入社會生活的領域中。較為年長的民衆（特別是本省民衆），自身或兄姐在和不同省籍的異性朋友交往或婚嫁的過程中，大概都曾經受到不少來自家庭的壓力。本省籍民衆對外省族群的此種社會敵意，主要來自政治領域；是政治領域中的族群分野和政治怨恨，在社會領域的擴散和延伸。

1980年代末期開始的民主化，是台灣政治發展最重要的分水嶺。之後的族群關係也開始進入另一個階段。如上所述，民主化之前族群關係的癥結，除了不幸的歷史事件外，同樣重要的是隨之而來的少數外省族群透過威權體制所維持的政治宰制。這項政治宰制擴散至文化、語言領域，同時也在族群的社會交往關係上，造成了緊張和隱藏性的衝突。在這個第一階段中，政治宰制是族群關係的核心。民主化對政治體制的衝擊是威權獨裁體制的解體；對族群關係的影響則是：族群界線不再是政治權力分配的基礎。因政治宰制而來的對本土文化、語言和歷史的壓抑，也因而解除。在族群的政治宰制瓦解之後，族群之間緊張的社會關係也逐漸消弭。民主化徹底改變了台灣的族群關係。正如大多數民主國家中的族群關係一般，族群關係的癥結比較不是政治權力的分配，而是文化象徵的衝突。也正如許多新興民主政體在民主化的初始階段中所面臨的，大眾的政治參與、政治菁英對失去政治權力的恐懼等，這些因素都刺激了族群的政治動員和族群關係的緊張(Snyder 2000)。台灣民主化必然的結果之一是，族群的政治力量和政治地位明顯互相對調。身為多數族群的本省人，不但立即取得優勢的政治地位，在取得政治優勢的過程中，也不斷地申訴其過去的冤屈：政治上的被剝奪和文化、尊嚴上的受壓抑。同時，正如「被壓抑彎曲的樹枝」(Berlin 1981 [1972])必然會有的反彈，本省族群以其特殊的歷史經驗為基礎，進一步地宣示其對新民族的想像：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獨立自主。而身為少數族群的外省民衆，不但在民主化之後迅

速失去其政治優勢地位，在本省人申訴冤屈的過程中，他們更是處於尷尬的地位：在許多本省人眼中，外省人如果不是加害者或幫手，至少是袖手旁觀者和受益者。而更重要的是：在本省族群以其文化和歷史經驗為基礎而宣示其民族想像的時候，外省人若非不願意，就是無法融入這個新民族的想像過程。而外省族群的不願意或無法分享這個新出現的認同，又造成了本省族群對他們的不信任。這項「認同」的衝突，是目前台灣族群關係最重要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表現。也就是說，現階段台灣族群關係的本質完全是政治性的，而非社會性的；是象徵性的、而非分配性的。

在民主化之後的每一次選舉，族群都成為顯著的議題，以及政治人物互相攻擊的話題。可是台灣族群問題的本質和其變化，似乎沒有獲得較完整的分析和掌握，而社會大眾對這項議題也似乎誤解多於理解。一位政治領袖這樣看待台灣的族群問題：「宋楚瑜說，我們不但都是『台灣之子』，也都是『中華民國的一份子』，希望有省籍考量的人都能捐棄成見，在這塊土地上共同打拼。根據學者調查結果，台灣因通婚普遍，早就沒有族群問題……」（中國時報 2000/12/18）。這樣的見解似乎反映了主流的看法。在社會層面上，兩個族群過去數十年的相處，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已經趨於模糊、甚至不存在；族群之間的頻繁通婚和其他形式的社會接觸，是台灣已經沒有族群問題(或「省籍問題」)的最佳例證。早於 1987 年民主化之後不久，《遠見雜誌》以「省籍是問題？」為題所做的專輯，也有類似的誤解。該專輯結論性文章的標題最足以顯示這樣的誤解：省籍不應該是問題，因為我們大家「都是中國人」（楊小萍 1987）。事實上，現階段台灣族群緊張的根源，正是因為愈來愈多的本省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同時對自認為是「中國人」的外省民衆充滿疑慮。

一直到現在，政治人物和主流媒體都仍舊以上一個階段的政治歷史情境，來理解現階段的台灣族群關係。在本文修改的過程中，由於李登輝主導成立「台灣團結聯盟」，族群問題再度成為政治論述中最熱門的話題。《中國時報》的社論認為，台灣的族群緊張是來自「有

著（白色恐怖）『虎口下』的記憶的一代終究難以遺忘，或甚至成爲族群動員的政治工具，以致於白色恐怖被簡化爲族群的壓迫……」（2001/6/20）。也就是說，目前族群緊張的根源只是本省人對外省人政治壓迫的歷史記憶的殘餘。主流媒體對現階段族群關係的理解，和事實遙遠得令人感到意外。不論是「社會已經融合，所以沒有族群問題」，或是「政治局面已經改變，所以不應有族群問題」，其對族群關係的理解都停留在上一個階段中。都沒有掌握到台灣族群關係在不同政治階段中的變化。以外省籍政治統治集團爲中心的威權體制，是台灣近代政治發展的第一階段；1980年代後期開始進行的民主化、以及因而造成的本省籍政治菁英掌握政治權力，是台灣族群政治的第二階段。族群關係在這兩個階段中，有不同的表現方式，也有不同的主題。上述引言所指涉的、也是一般所理解的，存在於族群之間的政治怨恨和社會敵意，主要是第一階段中的現象。在目前的第二階段中，族群關係其實有全新的發展和主題。比較這兩個階段中的族群關係，有兩個最重要的變化。第一項變化是族群之間社會敵意的逐漸消弭，究其原因，世代交替應該是重要的因素之一。在1980年代後期，55歲以下的人口對「外省人政權」的建立過程、對二二八事件都沒有親身的經驗。這些政治事件的記憶當然可以透過家庭社會化而傳承，可是在白色恐怖下，傳承的效果似乎非常有限。父代對自身的安全考慮只是原因之一，更重要的原因或許是在保護下一代。這樣的歷史記憶，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政治意識，在白色恐怖中對下一代的成長和安全是不利的。這也是爲什麼許多本省民衆，雖然能感受到父代對外省人的敵意，卻無法了解敵意的根源，甚至將它視爲「非理性」的情緒。因此戰後出生的本省世代，大多因爲歷史記憶的空白而沒有負載上一代的族群敵意。當這些事件在民主化之後獲得公開討論的機會而成爲公共的記憶的時候，它們已經是一個可以用平和的態度加以面對的遙遠歷史，而非必然引起深沈怨恨的親身體驗了。

族群敵意消弭的第二個因素或許是：族群社會接觸的頻繁，以及族群「文化分工」(cultural division of labor)的不存在，這兩個因素共

同作用的結果。數十年間快速的經濟成長、教育普及、產業結構快速變化、以及族群居住地域的分散，兩個族群接觸的機會頗為頻繁。然而單是族群的接觸並不能帶來社會敵意的消失。Gordon W. Allport 在其研究族群偏見、如今已幾乎成為古典的名著中指出，單是社會接觸並不能帶來偏見的消失和友善的態度。同樣重要的是接觸的情境和條件，如接觸的頻率和持續性、接觸者社會地位的相對高低、接觸的性質是競爭還是合作、接觸的社會氛圍是鼓勵還是懲罰等等(1986 [1954]: 261-282)。後來的許多研究似乎都支持這樣的看法，尤其是接觸者社會地位是否平等、接觸是否為合作性、社會氛圍是否鼓勵這三個因素，都決定了接觸能否消弭族群偏見。³雖然 Allport 接觸理論的焦點比較是族群「偏見」、而非族群敵意，可是其對族群敵意的消弭之解釋應有重要的啓示：族群文化分工在族群關係中的重要性。

族群「文化分工」指的是：優勢族群透過政治權力而壟斷了社會中所有的資源和地位。弱勢族群不但被剝奪政治權力，也無法接近其他類型的社會資源(Hecter 1975: 9)。台灣本省和外省族群之間的弱勢和強勢地位，除了在中央政治領域中甚為明顯之外，具政治優勢地位的外省族群，並沒有同時在經濟上佔有明顯可見的優勢。然而最近幾年卻有研究指出，外省族群在社會經濟地位上顯著高於本省族群。例如林忠正、林鶴玲(1992)指出，相對於客家和閩南族群，外省族群在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上，佔有明顯的優勢地位；吳乃德(1997)指出，在政治考慮下所施行的軍公教教育補貼政策，有助於外省族群在教育成就上的優勢，間接導致了外省族群在階級地位上的顯著優勢；駱明慶(2001)指出，外省族群因教育補貼而來的優勢，要到 1970-74 出生（即經濟繁榮的 1980 年代後期上大學）的世代，才開始消失。可是以上的研究發現，對一般人而言並非明顯可見。而且，在快速的經濟繁榮中，雖然有人比別人獲得更多，可是每一個族群也都有所收穫。對一般民衆而言，最明顯可見的是：許多本省民衆在經濟上取得可觀

3 對接觸理論的討論和後續研究的回顧，參閱 Forbes (1997)。

的成就；許許多多的中小企業家都是本省人。威權時期民間所流行的說法：「外省人掌握政治權力，本省人掌握經濟權力」，雖然是一個迷思，卻似乎準確地反映了一般民衆的認知。針對族群關係所做的調查訪問資料，也顯示了這樣的現象。在 1994 年的訪問調查中，60.6% 的閩南受訪者和 54.9% 的客家受訪者，認為外省人並不比他們各自的族群在經濟上更為富裕；另外 25.3% 的閩南受訪者和 29.4% 的客家受訪者認為外省人在經濟上雖較富裕，可是差距卻少於 2 分（10 分為滿分）。1999 年的訪問調查所得和 1994 年類似；上述數字各為 61.2%、61.6%，以及 27.6%、22.8%。⁴ 也就是說，大約 85% 的本省受訪者認為本省人的經濟地位並不比外省人差，或者即使較差，其差距也甚為有限。讓這項迷思容易使人信服的原因正是，兩個族群之間的差距沒有太過巨大而顯著。造成這個現象的最大原因，應該是教育機會的快速擴充和經濟的迅速繁榮，其擴充的速度和幅度遠大於政治權力可以影響的程度。兩個族群在經濟社會地位上不具有太大的差異，使得族群之間的社會接觸，許多是發生於相等社會地位的成員身上。此種「族群文化分工」的不存在，提供了透過社會接觸消弭社會敵意的必要條件。⁵

在這個第二階段中，雖然族群之間的社會距離已逐漸消失，政治分野卻沒有消失，只是有了新的主題。民主化為族群關係帶來的第二個重大變化是族群政治優勢地位的對調，以及新民族認同的勃興。在這個新的階段中，要求「尊重和承認」的反而是處於政治劣勢的外省族群。選舉中的族群動員和高程度的「族群投票」，是政治劣勢的外省族群要求認可和「代表」(representation)的具體表現。⁶ 而他們之所

4 本文所用的 1994 年資料，來自國科會支持的「台灣地區社會意向調查，1994 年 7 月定期調查」全國性的訪問研究，樣本總數為 1,437。1999 年的資料則來自同為國科會支持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同為全國性訪問調查研究，樣本總數為 3,496。

5 我無法以目前可得資料來證明這個論點。我們或許可以用南非和美國黑白種族的情境，來想像：如果族群的文化分工發生在台灣，會產生何種景象。如果本省籍的服務生、工友、司機等，接觸到的顧客、教授、雇主永遠只是外省籍，這種接觸所造成的族群之間的社會關係，絕對不同於現存之現象。

6 根據台大選舉研究室在選後的訪問調查資料，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有七成五的

以需要尊重與承認，也正是來自這個階段中的另一個趨勢：台灣新民族認同的勃興。以台灣語言、文化、和台灣歷史為基礎的新興台灣民族認同，勢必無法納入外省族群。雖然外省族群對台灣有愈來愈高的認同，⁷可是在以族群認同、族群歷史和文化為基礎的新民族想像過程中，外省民衆很難主動地融入這個過程。「台灣之子」所暗含的族群認同，和「中華民國一份子」的政治認同，其實有完全不同的意義。兩者不但沒有重疊，甚至是衝突的。「台灣」是新認同、新民族的象徵，而「中華民國」卻是舊的政治認同、代表舊民族的政治體制。外省族群的此種政治認同，和本省籍民衆的族群認同，兩者雖然都是本土認同的匯流，都有利於新國族的出現，可是也有所衝突和緊張（沈筱綺、吳乃德 1998）。

衝突和緊張的來源是，台灣族群認同和中國文化族群認同的衝突。外省籍民衆因其生活、歷史、和文化經驗而具有中國認同，是很自然的現象，可是對許多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民衆而言，這卻是一個不太能接受的事實。原因是，第一，新興台灣民族認同所競爭對抗、所要取代的對象，正是正統的中國認同。第二，目前台灣認同最大的敵人是堅持中國民族認同的中國政府。這兩個因素共同造成了，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族群對具有中國認同的外省族群的不信任。特別是在目前這個追求新民族的階段中，認同成爲許多人的重要價值和目標。民衆對認同的重視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認同成爲台灣目前政黨唯一的分野（吳乃德 1993）。懷著強烈的台灣認同，面對中國對台灣認同的武力威脅，感受外省政治菁英和媒體對台灣認同的攻擊，本省民衆很容易對心懷中國認同的外省同胞產生不信任感。在 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陳水扁宣稱他的競選對手馬英九「背後有一個賣台集團」。這項攻擊只是本省族群中具有台灣認同者，對外省族群在政治上不信

外省選民投票支持馬英九，而另外近一成則投票給王建宣；兩者合計 82.1%。這或許是台灣選舉有史以來最高程度的「族群投票」。

7 對民主化之後外省人在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上的變化及變化趨勢之分析，參見沈筱綺、吳乃德 (1998)。

任的極端反映。此種不信任是現階段台灣族群關係的主軸。外省族群目前所感到的或許是本省族群對其缺乏「尊重和承認」；可是本省族群所感到的卻是，外省族群不願意融入新民族的想像和創建過程。

此種認同的衝突是現階段台灣族群關係的主軸。台灣的族群關係是隨著政治變動而有所變化。在第一階段中，本省族群因政治權力的隔離，語言文化、歷史傳統的被壓制，而試圖透過政治力量確認其自尊、身分、和地位。此種文化自尊和政治自主的要求，在第二階段中成為新民族想像的基礎。由於這個過程所要對抗的正是中國人和中國民族主義，兩種族群身分所分別具有的中國認同和台灣認同傾向，乃成為衝突和緊張之源。這是目前台灣族群關係的主題。

以下的討論和分析將以認同的衝突為焦點，以實證資料支持下列幾個相關的論點。

以母語的使用為分界，台灣有閩南、客家、外省三個族群（暫不論原住民）。可是族群的分界不只是語言和文化，歷史和政治經驗也經常成為族群分界和族群認同的基礎。由於台灣的族群衝突和緊張主要來自政治認同，而在政治認同的建構和形成上，歷史經驗又是一個重要的基礎，閩南和客家在政治歷史的經驗上的同一，使他們的認同因此也大致相似。因此，台灣族群政治的分析單元是：「本省人」（閩南+客家）相對於「外省人」。

在現階段，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之間的社會隔離和排斥已逐漸降低。僅存的社會排斥感似乎只是上一個政治發展階段的殘餘。

雖然本省和外省兩個族群間在社會關係的層面上，已沒有敵意和緊張。可是本省人仍然普遍地認為外省人對台灣不夠認同。我們的樣本中有一半的本省籍受訪者，認為外省人比較不認同（「愛」）台灣。而且，具有台灣認同的本省人比較傾向於對外省人有這樣的印象和論斷。認同的衝突是目前族群緊張的泉源。

這項源自政治認同的族群衝突，並沒有擴散、入侵到社會生活領域。本省人的台灣認同並沒有導致他們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也就是說，政治上的不信任似乎並沒有妨害族群的社會接觸和融合。一個有

台灣認同的人，在政治上可能不信任外省人；可是政治不信任並不會破壞其和外省人的社會關係。

可是相對而言，期待族群的社會接觸有助於降低政治信任的人，也不能過於樂觀。除了最親密的婚姻（配偶）關係外，甚至和外省人有姻親關係（兄弟姊妹有外省配偶）的本省人，並沒有因而減低其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

總結而言，台灣的族群關係似乎純粹是政治現象，其緊張只存在於政治領域中。這個政治領域中的緊張關係，既不滲入社會領域，也不受社會領域的影響。

二、族群界線和分析單元

族群是一個難以捉摸的現象。Max Weber 對族群所下的定義雖然非常簡單扼要，可是卻同時包含了後來較少為人所注意的面向：歷史經驗和政治處境的重要性。這個面向對台灣的族群現象尤其重要。他說，「我們將這些人類團體稱為『族群』：因為具有相同的身體外觀、或相同習俗、或兩者皆有，或因為被殖民或移民的記憶，而在主觀上相信他們是共同祖先的後代」（1978: 389）。當代的族群研究卻比較忽略，被殖民和移民等經驗的歷史記憶在族群形成中的重要性。台灣的族群分野，正是以「被殖民」和「移民」兩個截然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政治處境所構成。而當代社會科學的族群研究經常強調的「文化記號」，就是韋伯所說的「習俗」。例如 Frederik Barth 雖然因為強調將族群視為「社會組織」而非文化實體，而對族群研究產生突破性的重大貢獻，可是仍不得不以文化差異界定族群的界線，雖然這項文化差異可由族群成員根據任何一個文化面向、象徵、或符號，主觀地加以認定或創造(1994)。

在為族群下簡單的定義後，或更正確地說，在提出族群形成的基礎後，韋伯繼續談到族群現象的一個重要特徵：上述具有這些共同特徵的「族群成員，並不（因而）構成一個群體；它只是讓群體較容易

形成而已（前引）。」也就是說，客觀上具有共同的文化記號、歷史記憶的人，在主觀上並不一定會因此而具有族群認同，形成一個具有自我意識的族群。從客觀的族群身分到主觀的族群認同、族群意識、甚至集體行動之間，仍有賴特殊的歷史和政治過程；這些政治過程包括現今所說的「族群動員」。韋伯認為，引發族群認同的主要因素是共同生活於政治社區；甚至當政治社區崩潰之後，此種認同都可能繼續遺留（前引）。也就是說，當我們以族群認同為研究焦點的時候，我們並不假設有相同族群背景的人，都會有這樣的認同。最近 Rogers Brubaker 和 Frederick Cooper 批評了社會科學對「認同」概念的執迷和濫用。他們認為，社會科學者錯誤地假設所有的人都具有群體認同、或都追求群體認同(2000: 10)。事實上，從韋伯開始，客觀的族群身分和主觀的族群認同就很清楚地被分開。本文雖然以本省人和外省人的分野來討論台灣的族群政治，但並不假設這兩個族群的所有成員，都具有不同的、甚至對抗性的族群認同和族群意識。

台灣的族群，如果以語言的使用為分界線，可以分成閩南、客家、和外省三個族群。這三個族群除了在母語的使用上明顯不同，在文化、自我認同、以及被認定的族群形象上，也有所不同。可是當我們分析「族群政治」的時候，當我們分析族群界線和緊張的政治表現的時候，我們必須考慮的背景因素是族群的政治處境。不同的語言文化族群，如果政治處境類似，可能有相同的政治表現。當具有相同政治處境、可是卻屬於不同語言文化的族群，同時面對著另一個在政治處境上明顯差異的族群，可能發展出相同的自我認同。這也是為何來自大江南北的不同省籍、甚至不同族群／民族（蒙古、回人等）的大陸移民，在台灣發展出同一群體意識的「外省人」認同。同理，台灣本地的客家人在面對來自中國的「外省人」的政治、文化優勢地位，也和具有相同政治處境的閩南人，發展出同一群體意識的「本省人」認同。

表一至表三是這三個語言文化族群分別在 1994 年和 1999 年的政治態度，包括「族群認同」、「民族認同」、和「政黨認同」。⁸ 從

這三個表中，我們可以發現：這三個語言族群的政治態度確實有所不同；而閩南和客家的政治態度並非完全相同，客家似乎正好介於閩南人和外省人之間。然而，我們同時也發現：雖然客家介於中間，可是卻遠為比較接近閩南人，比較遠離外省人。在「族群認同」上，1994年客家人中自認為是「台灣人」的比例是 38.6%，比閩南人中自認為「台灣人」的 46.3% 雖少了 7.7 個百分點，卻比外省人自認為「台灣人」的比例高出 24.5 個百分點。而自認為是「中國人」的比例，客家人雖然高於閩南人 10.9 百分點，可是卻低於外省人 24.5 百分點。雖然三個語言族群在「族群認同」上有所差別，雖然客家族群的態度介於本省和外省之間，可是客家人卻是比較接近閩南人的。在「政黨認同」上，客家人也是介於閩南和外省人之間。由於民進黨的領導階層皆為閩南人，而它對閩南語的使用也非常堅持，這些或許都疏離了客家人。然而即使如此，客家人對民進黨的支持率也是比較接近閩南人。如果我們檢視三個族群對新黨的支持率，客家和閩南的相似性、客家和外省族群的相異性，更清楚顯現：客家族群中支持新黨的比例和閩南族群一樣的低。⁹

就我們目前所關心的問題而言，最重要的是三個族群的「民族認同」態度。因為我們認為，民族認同的差異是當今台灣族群衝突的核心。表三透露一些重要的訊息。在 1994 年，客家人和閩南人的民族認同有顯著的差異；其「台灣民族主義者」的比例和外省人相差無幾，雖然其「中國民族主義者」的比例，顯著低於外省人。可是經過五年的變化，客家人的民族認同態度在 1999 年，已經和閩南人無法分辨了。（民主化之後不同族群民衆在民族認同上的變化、及變化的趨勢，參見沈筱綺、吳乃德 1998。）客家人和閩南人，除了在「中國

8 1994 和 1999 兩年資料同註四。

9 以投票支持候選人的族群背景分析，客家人也表現出類似介於中間、卻較接近本省人的傾向。在 1998 年的台北市長選舉中，本省、客家和外省籍民衆，投票支持馬英九的比例各為 39.1%、49.5%、和 74.4%。在 2000 年的總統選舉中，本省、客家、和外省籍選民支持宋楚瑜的比例分別是 22.3%、39.6%、和 70.1%（東吳大學選舉研究訪問調查資料，國科會資助，2001）。

民族主義者」的比例有些微的差距外，兩個族群在「台灣民族認同」和「現實主義」的態度上，幾乎是一致的，這和外省族群的民族認同表現出顯著的差異。由於客家族群的民族認同的態度和閩南一致，同時由於民族認同是當今族群緊張的核心，客家族群對外省人的態度和閩南族群對外省族群的態度相當一致。我們在文章的後半部，討論政治信任的時候，將以實證資料呈現這個重要現象。這些實證資料讓我們可以宣稱：當我們談族群政治的時候，我們分析的單元是「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之間的差異和衝突。因此，將客家人和閩南人同列為「本省人」有事實根據，而非「福佬沙文主義」的表現。

表一 母語族群背景與族群認同 (1994 & 1999)

族群		族群認同				(N) %
		台灣人	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中國人 也是台灣人	中國人	總計
閩南	‘94	(256)	(140)	(78)	(79)	(553)
		46.3	25.3	14.1	14.3	100
	‘99	(1,864)	(334)	(143)	(158)	(2,499)
		74.6	13.4	5.7	6.3	100
客家	‘94	(162)	(91)	(61)	(106)	(420)
		38.6	21.7	14.5	25.2	100
	‘99	(194)	(78)	(32)	(29)	(333)
		58.3	23.4	9.6	8.7	100
外省	‘94	(52)	(47)	(86)	(183)	(368)
		14.1	12.8	23.4	49.7	100
	‘99	(143)	(93)	(86)	(123)	(445)
		32.1	20.9	19.3	27.6	100
總計	‘94	(470)	(278)	(225)	(368)	(1,341)
		35.0	20.7	16.8	27.4	100
	‘99	(2,201)	(505)	(261)	(310)	(3,277)
		67.2	15.4	8.0	9.5	100

題目：

1994 如果有人問您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您會怎麼說？

1999 在台灣，如果有人問您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您會怎麼說？

表二 母語族群背景與政黨認同(1994&1999) (N) %

族群		政黨認同				總計
		國民黨	民進黨	新黨	獨立選民	
閩南	‘94	(117)	(51)	(10)	(373)	(551)
		21.2	9.3	1.8	67.7	100
	‘99	(388)	(315)	(16)	(1825)	(2,544)
		15.3	12.4	.6	71.7	100
客家	‘94	(131)	(20)	(17)	(269)	(437)
		30.0	4.6	3.9	61.6	100
	‘99	(72)	(32)	(4)	(238)	(346)
		20.8	9.2	1.2	68.8	100
外省	‘94	(140)	(9)	(51)	(174)	(374)
		37.4	2.4	13.6	46.5	100
	‘99	(129)	(12)	(31)	(290)	(462)
		27.9	2.6	6.7	62.8	100
總計	‘94	(388)	(80)	(78)	(816)	(1,362)
		28.5	5.9	5.7	59.9	100
	‘99	(589)	(359)	(51)	(2,353)	(3,352)
		17.6	10.7	1.5	70.2	100

題目：

在台灣有人是國民黨的支持者，也有人民進黨的支持者，另外有些人是新黨的支持者。請問您覺得自己是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

表三 母語族群背景與民族認同(1994&1999) (N) %

族群		民族認同			總計
		台灣民族主義	現實主義	中國民族主義	
閩南	‘94	(85)	(162)	(75)	(322)
		26.4	50.3	23.3	100
	‘99	(525)	(786)	(197)	(1,508)
		34.8	52.1	13.1	100
客家	‘94	(26)	(113)	(106)	(245)
		10.6	46.1	43.3	100
	‘99	(65)	(98)	(36)	(199)
		32.7	49.2	18.1	100
外省	‘94	(23)	(957)	(167)	(247)
		9.3	23.1	67.6	100
	‘99	(45)	(119)	(119)	(283)
		15.9	42.0	42.0	100
總計	‘94	(134)	(332)	(348)	(814)
		16.5	40.8	42.8	100
	‘99	(635)	(1,003)	(352)	(1,990)
		31.9	50.4	17.7	100

題目：

1. 如果台灣宣佈獨立之後仍然可以和中共維持和平的關係，那麼台灣就應該獨立成爲一個新國家。

2. 如果大陸和台灣兩地在經濟、社會、政治各方面的條件相當，那麼兩岸就應該統一。

台灣民族主義：同意 1、不同意 2

現實主義：同意 1、不同意 2

中國民族主義：不同意 1、同意 2

三、族群的社會融合

如果台灣族群政治的集體行動者，是由閩南和客家組成的「本省人」和「外省人」兩個族群，那麼這兩個族群的社會關係到底有什麼樣的變化？現今的狀況又是如何？以下我們將以實證資料分析這兩族群之間的社會交往。我們將指出，第一，本省和外省在社會交往（交友和婚姻）上已經高度的融合；第二，政治認同的衝突並沒有影響這樣的融合；第三，目前在某些本省人中所存有的對外省人的社會敵意，主要是歷史的殘留。

根據我們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所得，我們獲得的印象是：經過數十年的社會變遷和共處，這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關係似乎不若早先的緊張和敵意。戰後出生的第一代本省民衆中（其父母大多經歷過政權轉移和二二八事件的動盪時代），和異性外省朋友發展親密關係的時候，大多會遭遇家庭的強大壓力。這個極為普遍的成長經驗，似乎是戰後第一代本省人的共同記憶。而隨著戰前成長世代的凋零，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也愈來愈少聽到對外省人具有敵意的言詞和咒罵了。經過數十年的族群接觸、社會變遷和世代交替，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幾乎已經大致消除。

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或偏見的最重要表現，是不願意和敵對的族群成員發展親密的社會關係，如朋友關係和婚姻關係。特別是婚姻關係，它一方面反映了族群之間的和諧程度；另一方面也維持、或減低族群之間的緊張關係。例如愛爾蘭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間高度的內婚現象（1971年所締結的婚姻中，只有1.2%屬於外婚），是維持高度緊張的族群關係的重要因素之一。族群認同本是主觀的、後天形成的，可是內婚現象卻使「一個人的親戚、配偶的親戚、小孩、孫子女、父親、祖父母；兄弟姊妹的所有上述親人；配偶及其兄弟姊妹的所有上述親人都屬於同一族群。在這種情況下，族群認同成爲先天賦予(asccribed)的態度」(Buckley and Kenney 1995: 6)。過去許多研究都指

出，台灣族群之間的社交和婚姻隔離，有減低的趨勢（蔡淑鈴 1994; Tsai 1996; 章英華、黃毅志 1999）。以下我們以訪問調查所獲得的，關於朋友網絡和配偶的族群背景之資料，分別就不同的年齡層，更仔細地分析族群之間社會交往和婚姻關係的趨勢。我們發現：交友和婚姻的族群隔離雖然仍然存在，可是卻已隨著年齡層的減低而有明顯的降低趨勢。這正好顯示了社會變遷的效果。

以下我們對族群社會交往的趨勢做詳細的討論。在族群成員之間「交友」的隔離或融合狀況的分析上，我們使用 1997 年的「台灣社會變遷調查，第三期第 3 次，社會階層組」所獲得的研究資料。¹⁰ 這個訪問研究要求受訪者提出三個最要好的朋友，同時說明其性別、教育程度和族群背景等。為了分析的方便起見，我們採用和章英華、黃毅志(1999)相同的作法，將受訪者想到的第一位朋友定義為「最好的朋友」，並分析雙方各自的族群背景。我們接著估算不同年齡層中，本省受訪者和外省受訪者各自的「偏好同族交友」之相對比，以及他們「跨族群交友」之相對比。相對比的計算方式是「實際值」（樣本的實際數值）和「期望值」（沒有受到族群身分影響應有的數值），¹¹ 兩者的比例。相對比等於 1（「實際值」等於「期望值」），表示交友的選擇獨立於族群身分之外而不受其影響。如果「偏好同族交友」的相對比遠大於 1（「實際值」遠高於「期望值」），表示強烈的同族交往傾向，該族群的人偏愛和同族群的成員交朋友。同理，如果「跨族交友的相對比」數值甚小（「實際值」遠低於「期望值」），表示跨族群交友的傾向甚低，該族群的人很少跨越族群的界線結交不同族群的朋友。表四 A 是各個不同年齡層中，兩個族群的「偏好同族交友」和「跨族交友」的相對比。

表四 A 的數字和附錄一所載的統計檢定都顯示，族群身分在交友的選擇上，仍有顯著的影響力；雖然在 29 歲以下的最年輕年齡層中，

10 這個研究是國科會支持的全國性訪問調查研究，樣本總數為 2,596。

11 「期望值」的計算方式（以最低年齡層本省人為例）是： $(447 \times 463) / 509 = 407$ （參見附錄 1）。

其影響力已大為降低（這正符合本文的論點）。除此之外，表四 A 也透露幾個重要現象。第一，本省人對和同族群成員交友的偏好，並不特別強烈，而且各年齡層都大致相當；年紀大的本省人並沒有比年輕的本省人更偏好同族群的成員。可是和本省人相比起來，外省人卻顯示出較為強烈的同族偏好傾向，尤其是高年齡層的外省人。然而，外省人此種偏好和同族成員交往的強烈傾向，也是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顯著減低。在最低的年齡層中，外省人對同族群成員的偏好仍是顯著高於本省人。

第二個發現是關於「跨族群交友」，這是本文的核心關懷。表四 A 所透露的重要訊息是：雖然兩個族群的相對比都小於 1（族群身分對交友的負面作用），可是此種族群身分對交友所構成的阻礙，在兩個族群中的不同年齡層都有明顯的差異。比較出生、成長於戰後初期的 50 歲以上的本省人和最年輕的 30 歲以下的本省人，兩者跨族結交外省人好友的相對比，更能看出交友的族群融合的趨勢。60 歲以上本省人跨族和外省人結為好朋友的相對比只有 0.17，39 歲以下者卻高達 0.85。另一方面外省人也表現出相同的融合趨勢。如果我們考慮到以下兩個因素，這個數值將令人更為印象深刻。第一，外省人口比較集中於北部的都會區，而非平均地散居於全國（王甫昌 1993）。第二，外省人一般而言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因此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而其工作場域也較集中於現代性的產業。於傳統產業中工作、或具有較低社會地位的本省人，比較少機會和他們發展社會關係。這兩項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許多本省人在生活中很少有機會接觸外省人，遑論和他們發展親密的社交關係了。正如陳端容、陳東升(2001)的研究所發現的，居住地的族群接觸機會和教育程度，都影響了跨族群的社會交往。即使在此種結構條件的限制下，兩個族群的跨族交友仍然有如此高的比率，這似乎支持了族群社會融合的論點。¹²

除了社會交往外，最足以測量族群之間是否存有社會排斥的是婚

12 30 歲以下、大專教育的本省人之「跨族群交友」相對比高達 0.95 (19/20)。

姻關係。除了上引蔡淑鈴、章英華、黃毅志的研究，都共同發現台灣族群之間的婚姻隔離有降低的趨勢之外，王甫昌最近的研究(2000)也再一次印證了前人一致的發現。我們根據 1999 年的訪問調查資料，只從樣本中選擇 1951 年之後結婚的受訪者，以相同的方式計算其「偏好同族結婚相對比」和「跨族通婚相對比」。我們發現：族群的婚姻行為和上述的交友行為，表現出大同小異的模式。如表四 B 所示，兩個族群不論年齡都比較偏愛內婚。本省人對族內結婚的偏愛，在不同年齡層中都相當穩定。外省人的族內結婚雖然遠高於本省人，可是也隨著年齡層的降低，而有明顯的減低。而我們目前所關心的「跨族通婚」的模式，則和跨族交友模式有些差異。在外省人這方面，跨族通婚的相對比在各年齡層都相當穩定，這明顯是受到戰後初期婚姻市場高度扭曲的影響：高年齡層的外省人在適婚年齡時，因外省女性短缺而被迫跨族通婚。對本文而言更為重要的或許是本省人的跨族通婚行為。60 歲以上的本省人跨族和外省人通婚的相對比，低至 0.06，50 歲以上的年齡層也只有 0.33。可是在 30 歲以下的最年輕年齡層中，卻已高達趨近於 1（完全融合）的 0.92 了。在這裡我們同樣需考慮跨族群成員可得性的因素。正如跨族群的朋友交往一樣，婚姻配對同樣受到這個因素的影響。許多本省籍民衆的族群內婚型態，並非來自他／她們對外省人的排斥，而是來自後者在生活圈裡的可得性。即使如此，正如附錄一的統計檢定所顯示的，在最低的年齡層中，族群身分對婚姻關係的影響已經屬於完全不顯著的狀況。

以上我們用實證的資料，從台灣民衆的跨族群朋友交往和跨族群婚姻配對型態的實際行為中，顯示了本省和外省族群在社會關係上的融合。當然，兩個族群並非完全地融合，特別是在較高年齡的民衆中。對這些人而言，他們之所以缺乏跨族群的朋友或配偶，或許並非因為沒有接觸機會，而是因為族群的敵意和偏見。我們的生活經驗讓我們無法否認，族群敵意仍然存在於台灣社會中，而且發揮或多或少的的作用。以下我們將用目前可得的資料，分析族群敵意或偏見。我們將指出，第一，目前剩下的低程度的族群敵意，主要是過去政治情境

表四 族群社會交往、婚姻與年齡*

A 社會交往(1997)

年齡	偏好同族交友相對比		跨族群交友相對比	
	本省人	外省人	本省人	外省人
20-29	1.01	2.00	0.85	0.89
30-39	1.03	3.50	0.72	0.79
40-49	1.04	5.75	0.44	0.64
50-59	1.03	9.00	0.47	0.58
60-	1.04	∞**	0.17	0.38

B 婚姻(1999)(1951年及以後出生者)

年齡	偏好同族交友相對比		跨族群交友相對比	
	本省人	外省人	本省人	外省人
20-29	1.01	1.67	0.92	0.88
30-39	1.03	2.07	0.82	0.82
40-49	1.06	3.29	0.59	0.65
50-59	1.05	4.20	0.33	0.73
60-	1.18	5.00	0.06	0.76

*本表的計算基礎(實際值和期望值),參見附錄。

**因樣本數目過小,期望值=0。

的遺留。第二,目前族群在認同上的衝突並沒有影響到這樣的敵意;也就是說,政治領域中的歧異並沒有侵入社會領域。

本文以下對族群敵意的分析、以及接著所討論的族群政治信任,皆根據1999年國科會所支持的「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我們將以受訪者對「是否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此一問題的回答,作為測量族群敵意或偏見的指標。我們知道,對不同的族群懷有偏見或敵意,並不符合社會規範;因此受訪者回答這個問題時或會有所保留,可是我們目前仍然將之作為族群敵意的指標。因為,第一,我們無法從實際行為中去測量這個態度。正如上面的討論指出的,族群的社會交往常受限於異族群成員的可得性。許多沒有將女兒嫁給外省人、或沒有和外省人結婚的本省民衆,並非因為對外省人懷有偏見或敵意,而是由於族群數目的懸殊和居住地的集中,而無法在生活中接觸到。個人實際的交友或婚配行為,因此很難作為測量個人態度的指

標。第二，本文以下的討論並非在測量族群偏見或敵意的普及程度。我們在上一節的討論中，已經用整體的資料指出：即使包含了異族成員的低可得性，跨族社會交往仍然有明顯增高的趨勢。我們從日常生活中的觀察，似乎也支持這樣的論點。本文以下討論的焦點是：族群之間的政治衝突和社會交往，是否相互影響。更仔細地說，如果目前本省人對外省人還存有某種程度的敵意或偏見的話，那麼此種社會偏見的來源是什麼？也就是說，本文以下討論的主要目標不在評估族群社會敵意的普及程度，而在於評估政治態度和社會偏見之間的相關性。雖然受訪者對其真正的態度或有所隱瞞，可是我們假設：對這項態度的隱瞞並不受到政治態度的影響。以這樣的假設和保留，我們將分析政治態度和社會偏見的關連性。

表五A是不同族群成員對「女兒嫁給其他族群成員」的態度。閩南受訪者中，67.7%持「非常願意」或「願意」的態度；另外有16.8%的受訪者似乎有些勉強地回答「還算願意」；回答「不知道」的有6.7%。而回答「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的，只有8.7%。¹³這些回答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以及很勉強地回答「還算願意」的閩南受訪者，他們是否對外省人懷有敵意或偏見呢？或者只是單純地基於對自我族群的高度認同所產生的排外情緒？我們或許可以從閩南受訪者對客家人的態度，來對這個問題做初步的回答。如表五A所示，事實上，閩南受訪者中也有15.9%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客家人。相較於有8.7%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閩南人對客家人的距離似乎比對外省人更為遙遠。造成這個現象的一個原因或許是，閩南人對客家人有一刻板印象：客家女性一般而言比男性承擔更多的勞動；女兒嫁給客家人將來會很辛苦。如果我們問的是，願不願意娶客家女人為媳婦，答案或有所不同。無論如何，閩南受訪者有顯著更高的比例不願將女兒

13 回答「不知道」者是真的對這個問題沒有意見，或者只是「不願意」、卻不願明說的逃避行為？由於族群偏見是一個「社會不可欲的行為」，後者似乎是一個合理的猜測。可是我們檢查這些回答「不知道」者的教育背景、以及對其他態度問題的回答，我們發現：這些受訪者不但教育偏低，對其他態度的問題也都沒有意見。因此，我們比較傾向於認定他們是真的沒有意見。

嫁給客家人，這個事實提供了解釋他們爲何不願將女兒嫁給外省人的部分線索。

如果我們更仔細分析比較閩南受訪者對客家人和外省人的態度，我們發現更重要的現象。將閩南受訪者對客家人和外省人的態度並列比較，我們發現：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的受訪者，大多(74.9%)也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客家人。而勉強地「還算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的閩南受訪者中，甚至有 26.3%的人「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客家人，另外 63.4%的受訪者同樣勉強地「還算願意」將女兒嫁給客家人。我們知道，因近代政治歷史和政治事件所造成的閩南人和外省人緊張關係，絕不同於閩南人和客家人的關係。前者是政治敵意，後者則是文化偏見／偏好。可是我們卻發現，閩南人中對外省人和客家人刻意保持社會距離者，竟然大多爲同一群人。兩者高度重疊的這個現象似乎間接顯示：這群不願意將女兒嫁給外省人的閩南受訪者，他們這種態度的基礎似乎比較不是因政治情境而來的敵意，而比較只是單純的族群認同和文化排外心理。

當然，或許也有另一種可能性：雖然對客家人和外省人有社會排斥感的閩南人大多爲同一群人，可是他們排斥這兩個外族的動機卻不一樣。對外省人，他們懷有因政治而來的傳統敵意；對客家人，他們則懷有文化偏見。這兩種對客家和外省族群不同性質的排斥態度，同時存在於相同的一群人身上。如果是這樣，那麼他們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應該會和其他的政治態度，如台灣人認同、台灣民族意識等有顯著的相關。分別對閩南及客家受訪者的族群認同、民族認同，以及他們對外省人的社會偏見做初步的交叉分析，我們確實發現：在閩南的受訪者當中，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都和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態度有些相關性。（在客家人方面，或許由於樣本數稀少而不是很穩定。）有「台灣人」認同的閩南人比其他兩個認同群，有更高的比例對外省人有社會排斥感。同樣的，比較不具「中國民族主義」傾向的閩南人，也有更高的比例對外省人懷有相同的排斥態度。當然，在閩南人「族群民族主義」的趨勢中，「台灣人」認同和「台灣民族認同」是

表五 族群與社會敵意／偏見(1999)

A 三個族群交叉		如果你有女兒要嫁給____人，您心裡願不願意？			%
		本省閩南	本省客家	外省	
受訪者背景	本省閩南	--	60.7 ^a	67.7	
			16.4 ^b	16.8	
			15.9 ^c	8.7	
	本省客家		6.9 ^d	6.7	
			83.6		75.5
		10.1	--	13.3	
	外省		2.6	6.1	
			3.7	5.2	
		85.6	67.5		
	外省		9.3	16.2	--
			1.5	12.3	
			3.7	4.1	

^a「非常願意」+「願意」，^b「還算願意」，^c「不願意」+「非常不願意」，^d「不知道」

B 閩南人對其他族群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N) %
橫列百分比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直行百分比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客家人	願意	(1,478)	(36)	(28)	(7)	(1,549)
		95.4	2.3	1.8	.5	
		85.6	8.4	12.6	4.1	60.7
	還算願意	(119)	(272)	(23)	(5)	(419)
		28.4	64.9	5.5	1.2	
		6.9	63.4	10.3	2.9	16.4
	不願意	(116)	(113)	(167)	(9)	(405)
		28.6	27.9	41.2	2.2	
		6.7	26.3	74.9	5.2	15.9
	不知道	(13)	(8)	(5)	(151)	(177)
		7.3	4.5	2.8	85.3	
		.8	1.9	2.2	87.8	6.9
總計	(1,726)	(429)	(223)	(172)	(2,550)	
	67.7	16.8	8.7	6.7		

高度重疊的（沈筱綺、吳乃德 1998）。閩南人的政治認同和台灣人意識，確實會影響他們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態度。可是正如這兩個表同時也顯示的，這樣的影響並非很顯著；而且更重要的，有更多懷有台灣人認同和民族主義的閩南人，對外省人並沒有社會排斥態度（附錄二、三）。

如果政治認同態度只是稍顯著地影響閩南人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那麼到底是哪些重要的因素在發生作用？從台灣的政治發展史來看，一個可能的答案是年齡（世代）的作用。我們在本文第一部份的討論中曾經提及，台灣第一階段族群政治的特徵是來自外省人威權統治而導致的敵意。一般而言，年輕時期透過政治社會化過程所培養的態度，不太會在年長的時候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我們也有理由假設，許多閩南人年輕時期在外省人宰制的政治環境中所培養的對外省人的社會敵意，不會因政治環境的變化而改變。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所發現的閩南人對外省人的社會敵意，應該是歷史的殘遺，是台灣族群關係的第一階段的殘餘。如果我們的推測是正確的，那麼閩南人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態度應該只和年齡較顯著相關。將本省受訪者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態度，分別和年齡、教育之間的關係作初步分析，我們發現：教育和年齡和社會排斥態度都顯著相關；其中尤以年齡的相關性較為顯著（附錄四、五）。然而，以上所發現的這些影響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態度，是否只是年齡所發生的作用？爲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用統計模型對上述這些變項做控制分析，我們發現：在控制年齡之後，其他所有的變項都不再顯著。唯一可以解釋本省受訪者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的變項是「年齡」；而且同樣重要的是：主要的差別是在 50 歲（尤其是 60 歲）之後；20 歲到 50 歲之間的受訪者在對外省人的態度上並沒有差別（表六）。這頗爲符合我們的假設：本省民衆對外省族群的社會排斥主要是不同世代的政治經驗所造成的；而 50 歲剛好分割台灣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治世代」。

總結以上的討論和資料分析，我們可以對台灣的族群關係做兩個非常重要的結論。第一，從實際的交友和婚姻配對行爲加以觀察，本

表六 預測社會排斥多類別邏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1999)

A 閩南受訪者

	還算願意／願意		不願意／願意	
	b	s.e.	b	s.e.
性別(女性為比較組)	.2058	.1478	.0890	.1985
年齡(20~29 為比較組)				
30~39	.2484	.2068	-.5168	.3608
40~49	.1678	.2230	.5130	.3060
50~59	.1405	.2903	.8410*	.3606
60 以上	.3736	.3362	1.6703***	.3431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比較組)				
高中職	-.0959	.2017	.1759	.2581
專科	-.0500	.2369	-.1841	.3518
大學	-.0761	.2482	-.1446	.3571
民族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為比較組)				
現實主義	-.0034	.1601	-.0750	.2077
中國民族主義	-.3330	.2634	-.5801	.3883
族群認同(台灣人為比較組)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0630	.1944	-.2057	.2795
中國人	-.2551	.3169	-.8902	.5351
常數	-1.3829	.2635	-2.4321	.3606
LR χ^2			67.73***	
有效樣本數			1,419	

*p<.05, ***p<.001

B 客家受訪者

	還算願意／願意		不願意／願意	
	b	s.e.	b	s.e.
性別(女性為比較組)	-.4211	.4800	-.1133	.5815
年齡(20~29 為比較組)				
30~39	.2640	.6022	-.7843	.7539
40~49	-2.0745*	.9458	-.7957	.8054
50~59	-.7305	.9209	-37.2205	.0000
60 以上	-37.5519	.0000	-37.7440	.0000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比較組)				
高中職	-.2323	.6546	-.0110	.7733
專科	-1.4887	.8953	-1.2469	1.0258
大學	-1.2332	.8915	-1.9574	1.2585
民族認同(台灣民族主義為比較組)				
現實主義	.2444	.5394	-.2284	.6633
中國民族主義	-.4696	.7860	.0782	.8672
族群認同(台灣人為比較組)				
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0355	.5332	-1.0048	.8419
中國人	-36.1969	.0000	.3951	.9672
常數	-.4599	.7950	-.6527	.9287
LR χ^2			42.01*	
有效樣本數			188	

*p<.05

省和外省兩個族群的社會交往已因時代的變遷而具有高度的融合。第二，部分本省人對外省人的社會排斥感主要是歷史的殘餘；它大多存在於高年齡層和低教育者的民衆中。我們似乎可以用一句話來總結至目前為止的發現：本省人和外省人不但在社會交往上高度融合，我們在政治領域所觀察到的，兩個族群在政治認同上的衝突和緊張，似乎不太影響兩者之間的社會交往。

四、政治不信任：認同的衝突

如上所分析的，隨著台灣政治的巨變，第一階段中以外省人爲統治核心的威權政體所造成的族群緊張和社會排斥，已經大致過去。在社會交往上，本省人和外省人在社會交往上似乎已經相當地融合。可是在目前的政治發展階段中，卻出現新的族群緊張因子。這個新的族群緊張因子，來自認同的衝突。正如世界其他許多地區的例子一般，台灣在民主化之後，久爲威權政體壓抑的新認同獲得宣示的機會。新認同的宣示和營造，不可避免地與舊有的認同產生衝突。由於新舊認同的分歧大致沿著族群的界線，族群緊張因此也以認同的衝突爲核心。

就外省人而言，民主化造成他們原有的政治權力和政治影響力的喪失。可是，這種挫折或許只限於曾經擁有過、或曾經期待擁有政治權力的外省政治、學術、文化精英。對一般的外省人而言，現階段政治情境給他們最大的怨懣，或許是在新興台灣政治和文化認同的氣氛中，他們原有的文化、歷史認同的遭受蔑視。而此種「身分與承認」的不被尊重，正是本省人在前一階段的威權統治中所感受到的。不過這部分並非本文的主題。

本文的主題是在現階段族群政治中，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態度。我們在政治場域中觀察到，許多本省人對外省人懷有某種負面的形象、甚至是敵意。此種負面印象的主要內涵是：外省人不願認同台灣。在台灣和中國的緊張關係中，外省人如果不是偏向對岸的中國人，至少

也是不願為台灣社會付出的族群。此種因認同的衝突而導致的政治不信任，正是民主化之後台灣族群政治的主調。本文以下的討論，主要試圖了解：我們在政治場域所觀察到的此種不信任，是否反映了一般民衆的普遍態度，或只是本省政治精英的偏見？第二，同樣重要的，如果此種不信任確實存在於一般民衆中，那麼我們上節所印證的高度社會融合，是否減低此種政治上的不信任？也就是：社會融合是否有助於政治整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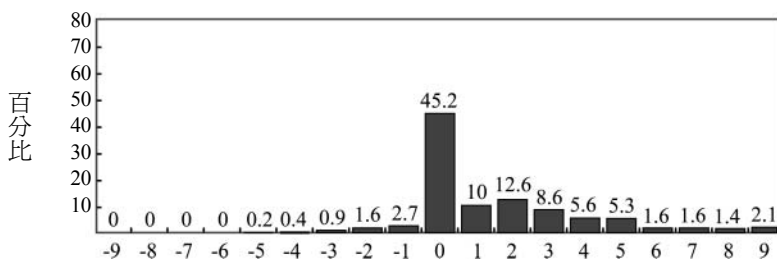
以下我們將分別針對閩南人和客家人，分析他們對外省人的政治認同形象。由於「認同」不是一般所使用的語彙，我們用最近經常被提到的「愛台灣」來測量對台灣的認同。事實上，目前政治人物所使用的「愛台灣」，其含意正是我們所說的認同。在訪問調查中，我們要求受訪者分別對台灣各個族群「愛台灣」的程度加以評分，分數從 1 分到 10 分。閩南的受訪者給閩南族群的分數，減去他們給外省族群的分數，是閩南受訪者所認定的，兩個族群對台灣認同的程度之差異。如果相減得 0 分（「愛台灣」的分數一樣），表示該閩南受訪者認為外省人和閩南人對台灣認同的程度沒有差異。正分則表示在這位閩南受訪者心目中，外省人比較不認同台灣。

圖一是這些分數的分配。從圖一 A 中，我們可以看到：大約只有一半(51%)的閩南人認為：外省人對台灣的認同和閩南人沒有區別。也就是說，有將近一半的閩南人認為，外省人確實是比較不認同台灣。而且在高達 17.6%的閩南人心目中，外省人和閩南人對台灣的認同差距四分以上。由於分數是從 1 分到 10 分，不論四分的差距是來自 6-2, 7-3, 8-4, 或 9-5 的差距，其落差其實是非常的巨大。想像一位閩南受訪者，當他認為閩南人愛台灣的程度是 7 分的時候，卻認為外省人愛台灣的程度只有 3 分！而此種對外省人持有如此負面印象的人，卻佔閩南人的將近 5 分之一。

閩南人對客家人則比較沒有這樣的印象。一方面，有將近四分之三的閩南受訪者認為客家人和閩南人對台灣的認同相當；而另一方面，即使有些閩南人認為客家人比較不認同台灣，其間的差距也不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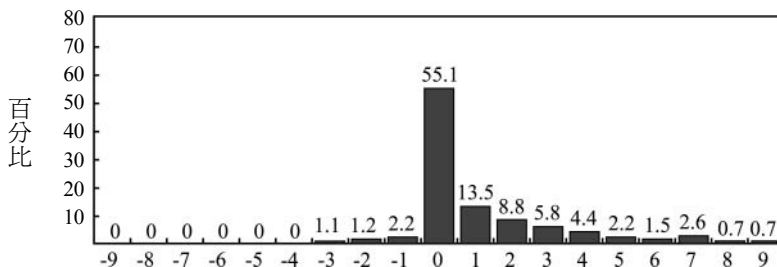
外省族群和閩南族群那麼巨大（圖一C）。相較之下，只有 2.6% 的閩南受訪者認為，客家人對台灣的認同差距高於四分。圖一B 則是客家受訪者對外省族群和自身族群，在台灣認同差距上的評估。比較圖一B

A 閩南受訪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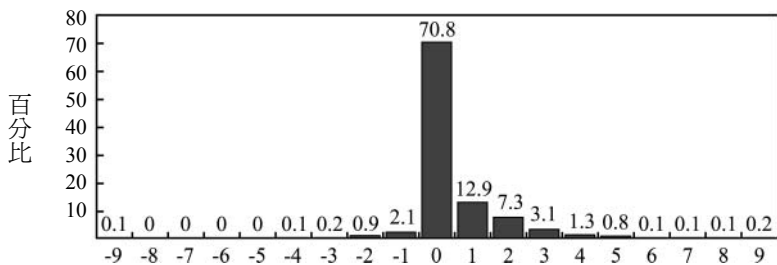
「政治不信任分數」測量受訪者族群愛台灣的分數——外省人愛台灣的分數

B 客家受訪者



「政治不信任分數」測量受訪者族群愛台灣的分數——外省人愛台灣的分數

C 閩南受訪者



「政治不信任分數」測量受訪者族群愛台灣的分數——客家人愛台灣的分數

圖一 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1999)

和圖一 A，閩南和客家兩個族群對外省人的政治態度印象，其實非常的類似。台灣的族群政治是以「本省人」和「外省人」為分野，在此又獲得進一步的支持。一方面，閩南人和客家人除了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的態度非常類似之外，在政治信任上彼此也沒有太大的距離和猜忌；在政治上，雙方似乎認定彼此屬於同一群體。而另一方面，閩南和客家對外省人的態度又非常一致。

如果閩南人和客家人認為外省族群對台灣不夠認同，那麼此種政治上的不信任應該會和民族認同的態度高度相關。事實上，我們的資料也支持了這樣的觀察（表七）。在閩南受訪者中，對外省人高度不信任（「愛台灣」的分數差距 4 至 9 分）者，將近一半是由「台灣民族主義者」組成，另外四成則是「現實主義者」。而另一方面，台灣民族主義者中也有顯著高的比例(28.2%)，傾向於高度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相較之下，現實主義者中則只有 16.5%持有高度的不信任態度，而中國民族主義者和無清楚民族認同態度者，更是鮮少（分別是 9.5%和 9.8%）對外省人有這樣的高度不信任感。從表七中我們發現，台灣認同愈強，就愈傾向於對外省人持有不信任的態度，愈認為外省人不夠認同台灣。民族認同成為族群之間政治信任的重要基礎，在此獲得實證資料的堅強支持。

以迴歸模型來檢視影響政治信任態度的變項，我們也有同樣的發現：雖然族群認同和民族認同高度相關，可是在控制了彼此的作用之後，兩者對政治信任仍然有顯著的獨立作用（表八）。台灣族群認同和台灣民族主義態度，都顯著地導致了本省民衆對外省人在政治上的不信任。除了這兩個變數之外，我們也發現其他的影響因素，例如年齡愈高愈傾向於在政治上不信任外省人。這應該是「世代」的作用，也是舊時代的殘餘態度。而在民族認同的態度上沒有意見（「不知道」）者，甚至比中國民族主義者顯著地沒有對外省人懷有政治不信任，這群民衆應該是屬於政治冷漠的一群。由於缺乏政治興趣和政治知識，他們對外省人的政治傾向亦無太大的既定印象。然而，其他的影響變數就比較不容易解釋，為什麼女性比男性較傾向於不信任外省

表七 民族認同與政治信任(1999)

本省（閩南+客家）受訪者	政治信任			(N) %
	高 (-9~0)	中 (1~3)	低 (4~9)	
民族認同 (橫列百分比) (直行百分比)				總計
台灣民族主義	(191) 38.0 21.4	(170) 33.8 30.7	(142) 28.2 44.8	(503) 100.0 28.5
現實主義	(381) 49.1 42.6	(267) 34.4 48.3	(128) 16.5 40.4	(776) 100.0 44.0
中國民族主義	(112) 56.0 12.5	(69) 34.5 12.5	(19) 9.5 6.0	(200) 100.0 11.3
不知道	(210) 73.7 23.5	(47) 16.5 8.5	(28) 9.8 8.8	(285) 100.0 16.2
總計	(894) 50.7	(553) 31.3	(317) 18.0	(1764) 100.0

$\chi^2=120.187$, $df=6$, $p<.001$

人？更難以解釋的是，為什麼高教育者反而較傾向於在政治上不信任外省人？是否因為高教育者有較高的政治關心，而低教育者則因為政治冷漠，而對外省人無任何特定的意象？這是目前我們無法回答的問題。

本文下一個迫切工作是了解：本文第一部份所討論的本省和外省在社會交往上的高度融合，是否對族群之間的政治緊張發揮減弱的作用。我們至目前為止的發現是：一方面，本省和外省兩個政治族群在社會交往上的高度融合；另一方面，政治認同上的差異又導致了普遍的不信任。這兩個現象的並存，衍生了一個無論在知識上或政治上都

表八 預測政治信任迴歸模型(1999)

本省受訪者		
	b	s.e.
性別(女性為比較組)	.3921**	.1236
年齡(20~29 為比較組)		
30~39	.2412	.1697
40~49	.9110***	.1779
50~59	1.5168***	.2372
60 以上	1.7729***	.2797
教育程度(國中以下為比較組)		
高中職	.1463	.1683
專科以上	.2213	.1715
民族認同(現實主義為比較組)		
台灣民族主義	.6112***	.1338
中國民族主義	-.1974	.1936
族群認同(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為比較組)		
台灣人	.4196**	.1575
中國人	-.1699	.2690
政黨認同(獨立選民為比較組)		
國民黨	-.1983	.1544
民進黨	1.0524***	.1502
新黨	-.2267	.5343
有外省配偶(無外省配偶為比較組)	.0631	.2022
有外省姻親(無外省姻親為比較組)	-.0175	.1533
常數	.1586	.2492
R ²	.1678	
有效樣本數	1,276	

p<.01, *p<.001

非常重要的問題：族群之間的社會接觸，是否有助於防止、或至少減低此種政治不信任感？如果閩南人對外省人在政治上的不信任是來自誤解、或是缺乏機會了解，那麼和外省人的社會接觸，是否有助於了解、並因而減低其政治上的不信任？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接觸，是否有助於減低政治緊張？

表九分析了跨族群的親密社會交往，和政治信任之間的關係。選擇婚姻關係作為親密社會交往的指標，我們將閩南受訪者依他們和外省人社會關係的親密程度，由遠而近分為下列四群人：1. 自己或兄弟

表九 社會接觸與政治信任(1999)

本省受訪者	政治信任			% (N)
	高(-9~0)	中(1~3)	低(4~9)	
姻親關係				總計
配偶姻親全為本省人	50.7	31.7	17.6	77.9 (1,781)
配偶為本省、有外省姻親	51.1	32.0	16.9	14.2 (325)
配偶為外省、無外省姻親	64.6	22.0	13.4	5.6 (127)
配偶為外省、有外省姻親	75.5	22.6	1.9	2.3 (53)
總計	52.1	31.0	16.9	100.0 (2,286)
	(1,191)	(708)	(387)	

姊妹均無外省配偶，2. 自己無外省配偶，可是兄弟姊妹中至少有一人有外省配偶，3. 自己有外省配偶，兄弟姊妹中無外省配偶，4. 自己有外省配偶，兄弟姊妹中也至少有一人有外省配偶者。比較這四群和外省人有不同婚姻或姻親關係者對外省人的政治信任，我們發現：如果親密的社會交往有助於提高政治信任，它似乎比較顯著作用於「配偶關係」上。「姻親關係」對政治不信任感的降低，似乎沒有顯著的作用。光有外省姻親並未能減低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感。可惜由於資料的限制，我們無法分析和外省人的親密朋友關係，是否有助於降低此種不信任感。我們目前只能說，即使如姻親這樣親密的社會關係，仍然未能減低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不信任感。表八所載的迴歸模型也顯示，社會交往無助於減低政治不信任的現象。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是否有外省配偶並不影響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政治信任。

社會融合和政治不信任的共存，實在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心理現象。一方面，本省和外省兩個族群之間有著高度的社會融合；不論是婚配或親密的朋友關係，兩個族群似乎對彼此都沒有太大的排斥。可是另一方面，閩南人又普遍存在著對外省人的不信任。甚至親密的姻親關係都沒有顯著地消弭這樣的不信任。Anthony Oberschall (2000)用「承平時期的心理架構(mind frame)」和「危機時期的心理架構」兩者的同時存在，來解釋南斯拉夫的族群為何平時能同居共處，可是卻又那麼容易被挑撥而激化。上面的討論似乎顯示，台灣的族群關係也存

在著兩個不同的心理架構：個體的和群體的。在個體層次的社會行為互動上，雙方幾乎沒有隔閡。可是在民衆的政治認知中，「外省人」作為一個群體仍有著其固定的負面形象。這兩個不同層次的心理架構彼此似乎互不干擾，這似乎是台灣族群關係在現階段的特徵之一。

五、討論

台灣的族群關係當然不只是「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關係而已。原住民和漢人之間的關係，也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民主化之後，原住民的自覺和集體行動也跟著出現。可是至目前為止，或許是由於人口數目及擁有資源的絕對劣勢，原住民運動仍未能形成較具規模的社會抗爭。對台灣政治產生重大影響的族群關係，一直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關係。而正如文中指出的，即使是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的族群關係，本文的討論也並沒有包括另一個重要的面向：外省人對本省人的態度，他們在本省人佔據政治優勢、並強力宣揚本土意識的潮流中，他們的處境和心理感受。本文的分析只限於本省人對外省人的態度。外省人對本省人、對自身處境的感受，應該是往後族群研究的重要課題。本文僅以現有的資料，試圖分析現階段中佔人口多數的本省人，他們對失去政治和文化宰制地位的外省人的印象和態度。

現階段的族群關係是以民主化為起點開始變化。台灣民主化之後，族群關係因政治局面的巨變而發生重大的變化。最重要的政治巨變不只是本省和外省族群政治優勢地位的對調，更重要的或許是，一個新的「台灣民族」的想像之出現。在這個民族形成的過程中，不同的族群由於其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承，而有不同的遭遇和處境。本文發現：在現階段中，本省人因過去受到政治壓迫而對外省人產生的政治敵意和社會偏見，似乎已大致消解。取而代之的卻是另一種性質的政治不信任。當部分本省人因過去的文化受壓抑、政治被剝奪而反彈、而要求建立文化和政治的自主性的時候，他們似乎普遍地認

爲，和他們比鄰而居的外省人不願意認同這個地方。這是現階段族群緊張最重要的源頭。

本省人對外省人的認同爲何會有這樣的印象？這樣的印象是否反映了真實的情況？這樣的印象不論是否正確，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沈筱綺、吳乃德(1998)指出：近幾年外省人雖然逐漸產生對台灣的政治認同，可是仍然保持了中國的文化認同。此種中國文化認同，和部分本省人所懷有的以台灣歷史經驗爲基礎的台灣族群民族主義，是無法相容的。此種中國認同一方面是來自外省族群的歷史和文化經驗，另一方面則可能是台灣族群民族主義無法加以接納的結果。

除此之外，外省人政治文化菁英的行爲和言論，也加強了這樣的印象。並不是每一個本省人都有機會和外省人作同事、朋友、和親戚。族群印象因此很大一部分是得自高能見度的政治菁英的行爲和言論。台灣民族認同最大的敵人是中國政府，可是卻有外省政治精英（梁肅戎、許歷農、王曉波）等人赴日本參加中國政府統戰部策劃的「全球反獨促統大會」（中國時報 2001/7/16）。中國對台灣是一個強大的軍事威脅，可是外省籍的退役高級將領許歷農，卻率領三十多名退役將軍訪問中國（中國時報 2001/7/30）。而外省的文化政治人物龍應台(2001)則說道，「在我的眼中沒有國家的區別，只有城市的存在。」身爲社會科學的工作者，我們當然可以理解，這是外省人顛沛流離的歷史經驗，加上她本人長期的國際經驗，在目前台灣的政治處境中容易發展出來的態度。可是在許多本省人對獨立國家的盼望仍在艱苦掙扎的情況下，外省文化菁英這樣的說法會加深本省人對外省人在認同上的不信任，也是自然的現象。陳水扁在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指控其外省對手馬英九「背後有賣台集團」（聯合報 1998/10/8）；李登輝譴責國民黨「聯共反台」（中國時報 2001/9/26）。部分民進黨立委在國安局資料外洩事件後，發起組織「反賣台聯盟」，指控親民黨等台灣統派從「聯共反台」、「招叛賣台」演變成「引共治台」（台灣日報 2002/3/28）。台灣日報更以題爲「宋楚瑜與親民黨有無內神通外鬼應說個明白」發表社論(2002/3/28)。這些或許也都反映了許多民

眾的疑慮，雖然這樣的說法只會加深民眾已有的不信任，對族群關係的解決毫無助益。

認同的衝突並不易解決，因為它牽涉到的並不是物質利益或權力的分配，而是符號象徵的衝突。可是正視它、理解它，卻是解決的第一步工作。而政治人物，由於其高曝光度和代表性，對族群緊張的解決居有樞紐的地位，媒體的角色更是不可忽視。Jack Snyder (2000)認為，許多新興民主國家在民主化之後，立即陷入族群暴力衝突的危機，主要是因為媒體的不中立。各媒體都有其族群立場，也吸引相同立場的讀者，其報導和評論也因此從各自的立場出發，結果造成族群之間更大的不信任、緊張、和衝突。¹⁴可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和主流媒體對現階段的族群緊張，不是有所誤解或故意忽視，就是加以無益的譴責。例如李登輝推動成立「台灣團結聯盟」之後引起公共輿論對族群關係的熱烈討論和相互攻擊。討論和攻擊以「本土化」為核心（本土化的意義正是「台灣認同」），可是我們的政治領袖卻是以下列的方式來理解本土化和台灣認同。

「本土」首重「不要忘本」，國家領導人應「以民為本」…(宋楚瑜，中國時報 2001/5/10)

請問有哪一位立委不是本土？難道是外星來的嗎？…國家經建能分本土和非本土嗎？(宋楚瑜，中國時報 2001/6/17)

我們哪一個人不本土呢？我在台北住了四、五十年，不是本土是什麼？(馬英九，中國時報 2001/6/28)

14 在本文最後的潤飾階段中，適逢中國時報舉辦「『媒體採縱』與『採縱媒體』座談會」，並以全版的顯著地位刊出發言內容(2002/10/28)。可惜與會的諸學者和媒體工作者只關注媒體八卦化的市場取向，毫無討論媒體在族群關係上缺乏中立性。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

國民黨五十年來都在為台灣人民打拼，創造豐衣足食的生活，難道這樣還不夠本土化嗎？(吳伯雄，中國時報 2001/7/30)

如果政治人物對本土化的意義有所誤解、或故意曲解，主流媒體對以台灣認同為內涵的本土意識則是攻擊不餘遺力。「在政治操作道德上，卻無疑是卑鄙的、陰暗的、狹隘的、愚民的、乃至低級病態的」（楊憲村 2001）。主流媒體以此種語言描述宣揚本土意識的政治人物，除了加深民衆的本土意識，加強對外省人擁有之媒體的不信任外，對族群緊張的解決毫無助益。

本省人以其族群認同為基礎，提出其對新民族的想像，這是歷史發展自然的結果；外省人的文化傳承和歷史經驗，保持了他們的中國認同，這是歷史發展自然的結果；本省人的族群民族主義不易（非無法）納入外省族群，這是歷史發展自然的結果；本省人因而對外省人懷有政治上的不信任，也這是自然的結果。可是以上所有的自然都非必然。人類有意識的、謹慎的、熟慮的行為，經常可以改變歷史發展的方向。在傳播媒體如此普遍而深入的現代台灣社會中，政治菁英和媒體工作者的行為和言論對族群關係的改變都有深遠的影響。如何改變台灣的族群關係，我們有所思考，可是並不確知。我們確知的是：目前政治菁英和主流媒體對族群關係的本質不是一無所知、就是刻意不加以認知，反而只是盲目地譴責對方族群挑起族群情結。這不但無助於解決問題，而且只會製造更多問題。

誌謝：本文發表於「台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差異、認同、與階層化」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2001年1月12日。我過去所寫的文章沒有任何一篇像本文那樣，獲得那麼多人的幫助：研究助理楊嘉容的協助遠超過統計資料的處理；徐火炎教授對統計方法提供的諮商；本刊兩位匿名評審以及一位匿名編委對原稿的理論思辨、統計運作、和修辭，都提供了非常用心和仔細的批評和建議；特別是蔡淑鈴教授對統計方法的指點，不只修正了本文對族群社會交往的分析，而且也擴充了分析的廣度和深度。李安妮教授則在定稿之前及時提供意見，讓本文的核心概念「政治信任」更清楚地呈現。我很樂意和他們分享本文的成果。錯誤當然是我自己的。

附錄一 族群社會交往、婚姻偏好與年齡

(1997, N=2,239)

觀察值(期望值)

年齡	受訪者	第一位好朋友				總計
		本省		外省		
20-29	本省	413	(407)	34	(40)	447
	外省	50	(56)	12	(6)	62
		$\chi^2=9.142$ df=1 p<.01				509
30-39	本省	600	(585)	38	(53)	638
	外省	57	(72)	21	(6)	78
		$\chi^2=40.409$ df=1 p<.001				716
40-49	本省	524	(505)	15	(34)	539
	外省	34	(53)	23	(4)	57
		$\chi^2=121.878$ df=1 p<.001				596
50-59	本省	262	(254)	7	(15)	269
	外省	11	(19)	9	(1)	20
		$\chi^2=63.986$ df=1 p<.001				289
60-	本省	120	(115)	1	(6)	121
	外省	3	(8)	5	(0)	8
		$\chi^2=64.359$ df=1 p<.001				129

(1999, N=2,497)

觀察值(期望值)

年齡	夫	妻				總計
		本省		外省		
20-29	本省	148	(146)	23	(25)	171
	外省	15	(17)	5	(3)	20
		$\chi^2=1.909$ df=1 p=.167				191
30-39	本省	503	(488)	67	(82)	570
	外省	67	(82)	29	(14)	96
		$\chi^2=22.765$ df=1 p<.001				666
40-49	本省	643	(604)	55	(94)	698
	外省	72	(111)	56	(17)	128
		$\chi^2=118.683$ df=1 p<.001				826
50-59	本省	314	(298)	8	(24)	322
	外省	44	(60)	21	(5)	65
		$\chi^2=70.813$ df=1 p<.001				387
60-	本省	273	(232)	1	(17)	274
	外省	52	(68)	20	(4)	72
		$\chi^2=103.906$ df=1 p<.001				346

附錄二 族群認同與社會排斥(1999)

(本省閩南)						(N) %
族群關係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總計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台灣人	(1,220)	(327)	(183)	(131)	(1,861)	
	65.6	17.6	9.8	7.0	100.0	
台灣人也是 中國人	72.2	77.9	83.2	79.4	74.6	
	(350)	(73)	(29)	(24)	(476)	
中國人	73.5	15.3	6.1	5.0	100.0	
	20.7	17.4	13.2	14.5	19.1	
中國人	(120)	(20)	(8)	(10)	(158)	
	75.9	12.7	5.1	6.3	100.0	
總計	7.1	4.8	3.6	6.1	6.3	
	(1,690)	(420)	(220)	(165)	(2,495)	
	67.7	16.8	8.8	6.6	100.0	

$\chi^2=19.129$, $df=6$, $p<.01$

(本省客家)						(N) %
族群關係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總計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台灣人	(146)	(25)	(14)	(9)	(194)	
	75.3	12.9	7.2	4.6	100.0	
台灣人也是 中國人	58.2	55.6	66.7	56.3	58.3	
	(83)	(18)	(4)	(5)	(110)	
中國人	75.5	16.4	3.6	4.5	100.0	
	33.1	40.0	19.0	31.3	33.0	
中國人	(22)	(2)	(3)	(2)	(29)	
	75.9	6.9	10.3	6.9	100.0	
總計	8.8	4.4	14.3	12.5	8.7	
	(251)	(45)	(21)	(16)	(333)	
	75.4	13.5	6.3	4.8	100.0	

$\chi^2=4.197$, $df=6$, $p=.650$

附錄三 民族認同與社會排斥(1999)

(本省閩南)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N) %
族群關係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台灣民族主義	(361)	(82)	(50)	(33)	(526)	
	68.6	15.6	9.5	6.3	100.0	
現實主義	(571)	(124)	(65)	(24)	(784)	
	72.8	15.8	8.3	3.1	100.0	
中國民族主義	(155)	(23)	(9)	(10)	(197)	
	78.7	11.7	4.6	5.1	100.0	
其他	(639)	(200)	(99)	(105)	(1,043)	
	61.3	19.2	9.5	10.1	100.0	
總計	(1,726)	(429)	(223)	(172)	(2,550)	
	67.7	16.8	8.7	6.7	100.0	

$\chi^2=59.441$, $df=9$, $p<.001$

(本省客家)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N) %
族群關係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台灣民族主義	(48)	(9)	(6)	(2)	(65)	
	73.8	13.8	9.2	3.1	100.0	
現實主義	(77)	(13)	(6)	(2)	(98)	
	78.6	13.3	6.1	2.0	100.0	
中國民族主義	(29)	(3)	(3)	(1)	(36)	
	80.6	8.3	8.3	2.8	100.0	
其他	(108)	(21)	(6)	(13)	(148)	
	73.0	14.2	4.1	8.8	100.0	
總計	(262)	(46)	(21)	(18)	(347)	
	75.5	13.3	6.1	5.2	100.0	

$\chi^2=10.059$, $df=9$, $p=.346$

附錄四 年齡與社會排斥(1999)

(本省閩南)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N) %
年齡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20-29	(428) 73.5	(95) 16.3	(37) 6.4	(22) 3.8	(582) 100.0	
30-39	(447) 71.5	(116) 18.6	(29) 4.6	(33) 5.3	(625) 100.0	
40-49	(452) 66.2	(109) 16.0	(59) 8.6	(63) 9.2	(683) 100.0	
50-59	(209) 61.8	(62) 18.3	(37) 10.9	(30) 8.9	(338) 100.0	
60 歲以上	(190) 59.2	(46) 14.3	(61) 19.0	(24) 7.5	(321) 100.0	
總計	(1,726) 67.7	(428) 16.8	(223) 8.7	(172) 6.7	(2,549) 100.0	

$\chi^2 = 87.468$, $df = 12$, $p < .001$

(本省客家)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N) %
年齡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總計	
20-29	(48) 68.6	(14) 20.0	(6) 8.6	(2) 2.9	(70) 100.0	
30-39	(69) 69.7	(19) 19.2	(6) 6.1	(5) 5.1	(99) 100.0	
40-49	(79) 80.6	(7) 7.1	(7) 7.1	(5) 5.1	(98) 100.0	
50-59	(35) 81.4	(3) 7.0	(2) 4.7	(3) 7.0	(43) 100.0	
60 歲以上	(31) 83.8	(3) 8.1	--	(3) 8.1	(37) 100.0	
總計	(262) 75.5	(46) 13.3	(21) 6.1	(18) 5.2	(347) 100.0	

$\chi^2 = 16.491$, $df = 2$, $p = .170$

附錄五 教育程度與社會排斥 (1999)

(本省閩南) (N) %

教育程度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總計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國中以下	(689) 62.6	(177) 16.1	(129) 11.7	(105) 9.5	(1,100) 100.0
高中職士官	(516) 69.0	(133) 17.8	(54) 7.2	(45) 6.0	(748) 100.0
專科	(280) 72.7	(68) 17.7	(21) 5.5	(16) 4.2	(385) 100.0
大學以上	(234) 75.7	(51) 16.5	(18) 5.8	(6) 1.9	(309) 100.0
總計	(1,719) 67.6	(429) 16.9	(222) 8.7	(172) 6.8	(2,542) 100.0

 $\chi^2 = 58.337, df = 9, p < .001$

(本省客家) (N) %

教育程度	是否願意把女兒嫁給外省人				總計
	願意	還算願意	不願意	不知道	
國中以下	(98) 77.8	(14) 11.1	(7) 5.6	(7) 5.6	(126) 100.0
高中職士官	(77) 70.0	(19) 17.3	(8) 7.3	(6) 5.5	(110) 100.0
專科	(44) 73.3	(9) 15.0	(5) 8.3	(2) 3.3	(60) 100.0
大學以上	(42) 84.0	(4) 8.0	(1) 2.0	(3) 6.0	(50) 100.0
總計	(261) 75.4	(46) 13.3	(21) 6.1	(18) 5.2	(346) 100.0

 $\chi^2 = 6.686, df = 9, p = .670$

參考文獻

- 王甫昌 (1993) 光復後台灣漢人族群通婚的原因與形式初探。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6: 43-94。
- (2000) 台灣的族群通婚與族群關係再探。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中心主辦，第四屆華人社會指標研究研討會，香港，12月14-16日。
- 沈筱綺、吳乃德 (1998) 文化族群與公民國族：台灣民族形成的兩條路徑。東吳大學主辦，全球化的挑戰與台灣社會研討會 4月16-17。
- 林忠正、林鶴玲 (1992) 台灣地區各族群的經濟差異。頁 101-160，張茂桂等著，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吳乃德 (1993) 國家認同和政黨支持：台灣政黨競爭的社會基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74: 33-61。
- (1997) 檳榔和拖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其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 1: 137-167。
- 陳端容、陳東升 (2001) 跨族群的社會連結：工具理性行動邏輯與社會結構的辯證。台灣社會學刊 25:1-54。
- 章英華、黃毅志 (1999) 婚姻與朋友核心網絡的變遷：1970 與 1990 年代的比較。台灣社會的個人網絡：第三次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研討會，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主辦，台北，5月18日。
- 張茂桂、吳忻怡 (2000) 關於民族主義論述中的認同與情緒：尊重與承認的問題。東吳大學、民族主義合辦，百年來海峽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研討會，12月2-3日。
- 楊小萍 (1987) 都是中國人。遠見雜誌 13: 28-32。
- 楊憲村 (2001) 「本土化」的背後。中國時報 7月14日。
- 蔡淑鈴 (1994) 台灣之婚姻配對模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 6(2): 335-371。
- 駱明慶 (2001) 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 29(2): 117-151。
- 龍應台 (2001) 台灣要不要走出去？中國時報 1月8日。
- Allport, Gordon W. (1986[1954]) *The Nature of Prejudice*.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 Barth, Ferderik (1994) Enduring and Emerging Issues in the Analysis of Ethnicity. Pp. 11-32 in *The Anthropology of Ethnicity: beyon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edited by Hans Vermeulen and Cora Govers. Amsterdam: Het Spinhuis.
- Belfrage, Sally (1990[1965]) *Freedom Summer*. Charlottesville: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Press.
- Berlin, Isaiah (1981[1972]) Nationalism: Past Neglect and Present Power. Pp. 333-355 in *Against the Current: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Idea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rubaker, Rogers, and Frederick Cooper (2000) Beyond Identity. *Theory and Society* 29: 1-47.
- Buckley, Anthony D., and Catherine Kenney (1995) *Negotiating Identity: Rhetoric, Metaphor, and Social Drama in Northern Ireland*. Washington: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
- Forbes, H. D. (1997) *Ethnic Conflict: Commerce, Culture, and the Contact Hypothesi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Hecter, Michael (1975) *Internal Colonialism: the Celtic Fringe in British National Development, 1536-1966*.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cAdam, Doug (1988) *Freedom Summ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Oberschall, Anthony (2000) The Manipulation of Ethnicity: from Ethnic Cooperation to Violence and War in Yugoslavia.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23,6 (November): 982-1001.
- Parsons, Talcott (1975) Some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Nature and Trends of Change of Ethnicity. Pp. 53-83 in *Ethnicity: Theory and Practice*, edited by 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90) *Domination and the Arts of Resistance: Hidden Transcrip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nyder, Jack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s*. New York: W. W. Norton.
- Tsai, Shu-ling (1996)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Ethnicity and Education in Taiwan's Changing Marriage Marke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Science Council, Part C: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6,2(July): 301-315.
-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Edited by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Wilkie, Curtis (2001) *Dixie: a Personal Odyssey through Events that Shaped the Modern South*. New York: Scribner.